读史札记

席勒图库稜班第大诺们汗事迹考述

宝音德力根

席勒图库稜①(širegetü küreiyen) 第一任扎萨克喇嘛班第大诺们汗是活跃于 17 世纪 30–50 年代清藏蒙关系历史舞台上的著名高僧，对崇德、顺治两朝政教事务影响极大。学界对班第大诺们汗研究虽然不少，但错讹也很多，甚至将其事迹与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等高僧相混淆。本文在重读班第大诺们汗传记的基础上，结合《五世达赖喇嘛传》《清实录》等相关记载，进一步探讨其政教事迹。当然，重点是目前学界尚不知的以及与其他高僧相混淆的一些重要事迹。

一、出家寺院及恩师

内蒙古库伦旗曾经藏有藏文《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tegüs čoγtu nom-un uγ γarulγ-a-yin namtar-i sayidur nigen ǰüg-tü quriyangγuilaγsan toli)，是席勒图库稜创建者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和历任扎萨克喇嘛传记，今只剩蒙古文译文。② 其中，第三份为《大智慧席勒图绰尔济强林班第大诺们汗传》(以下简称《诺们汗传》)，开篇记其出家与恩师：

> 三世大智慧席勒图绰尔济强林班第大诺们汗（yeke mergen ǰamling bandida nom un qaγan），自十二岁起入 Dayibo rasang 学经，获然坚巴学位。[后] 师从林麦夏仲（Lingmed šabarang）闻习诸多显密经典，存于心中而成为大智慧者。本名西布札衮如克（šibǰa günrek，源自藏文 shes bya kun rig），以强林西布札然坚巴（ǰamling šibǰa rabǰanba）闻名。

关于诺们汗的恩师 Lingmed šabarang，学界尚不知为何人。Lingmed šabarang 汉译应作“林

[收稿日期] 2020-03-02
[作者简介] 宝音德力根（1963－），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教授，呼和浩特 010021；buyandelger@163.c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36 — 1720 年西藏、蒙古与清朝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7701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37) 阶段性成果。

① 库稜，又译“枯伦”“库伦”，译自蒙古语 küriyen-küriy-e，源自蒙古古代军事生产单位“古列延”。藏传佛教上师大德们在蒙古社会传教之初，其宗教、世俗生活区被称为“库稜”，包括供奉佛像的毡帐以及周围的喇嘛僧徒所住毡帐群。“席勒图”(širegetü) 指管理众喇嘛的法台，是对藏文寺院职位 khri pa (赤巴，首座，例如甘丹寺的“甘丹赤巴”) 的意译。“席勒图库稜 (库伦)”一般指清代内扎萨克蒙古政教合一的一个特殊旗，今内蒙古库伦旗土著蒙古人就是该扎萨克旗属民 (沙弥纳尔) 后裔。

② 原文为藏文，成书于道光初年。1959 年，库伦旗人民政府组织几位有学问的老喇嘛译成蒙古文，于 1960 年油印。文革期间藏文原文被损毁。1989 年齐格奇根据油印本译为汉文，取名《席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传汇典》，发表在《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本文所据为哲里木盟档案管理处蒙古文油印本。

麦夏仲”，而这位林麦夏仲，笔者认为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恩师和保护人、第三十五任甘丹赤巴林麦夏仲（gling smad zhabs drung，1573−1646）。林麦夏仲本名官却群培（dkon mchog chos vphel），又称赤钦官却群培、嘉央官却群培，八岁时在萨迦派寺院扎西曲林（应为山南琼结县的扎西曲林寺）出家，不久在桑浦寺（gsang phu nevu thog dgon，在今拉萨火车站南山上）达波扎仓（dwags-po-grwa- tshang）和热堆寺（Rwa-stod）等寺院学习佛法，l596 年从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班觉嘉措受具足戒，后任桑浦寺林麦扎仓法台（zhabs drung），因此被称为林麦曲杰。1621 年以下密院夏仲身份与四世班禅一同调停青海土默特首领罗布藏丹津嘉措、古如洪台吉与藏巴汗之间的战争，与藏巴汗达成合议，并选定阿旺洛桑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① 这位灵童即五世达赖喇嘛，坐床后，林麦夏仲担任其经师和监护人。期间，在 1626−1634 年担任甘丹赤巴。② 在五世达赖喇嘛成年前，林麦夏仲与四世班禅共同执掌格鲁派，成为 17 世纪 20−40 年代格鲁派主要决策人。木猴年（1644）达赖喇嘛为其恩师撰写了一篇简略传记，作《嘉央喇嘛官却群培传》。③ 两年后即藏历火狗年（1646）林麦夏仲圆寂，时年 74 岁。林麦夏仲还是强巴林寺住持班禅・强巴林巴（札囊十三杰之一）的转世活佛。④

确定诺们汗的恩师为林麦夏仲之后，便可推知诺们汗少年出家的 dayibo rasang 在哪里。蒙古语 rasang 即藏语 tshang，系藏传佛教寺院所属学院，汉译“扎仓”；dayibo 是某扎仓的之名。日本学者若松宽推测班第大诺们汗出家的 dayibo rasang 可能是哲蚌寺果芒扎仓下所属迭部康村（The-bo khams-tshan），⑤ 恐误。因为 The-bo 与 dayibo 不能勘同，而前者是扎仓之下的一个康村（khams tshan，僧团）名，而非扎仓名。诺们汗出家时，林麦夏仲在桑浦寺任林麦扎仓法台（称林麦夏卜仲），⑥ 因此他才得以师从后者。由此笔者认为其出家的 dayibo rasang 应是桑浦寺达波扎仓（dvags-po-grva-tshang），《诺们汗传》蒙古文 dayibo 应是 daγbo 的误写（字形：daaibo、daaabo）。

二、以班禅、达赖喇嘛密使身份来到盛京

《诺们汗传》叙述了其来盛京的原委以及与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的关系：

> 彼时雪域依怙班禅确 [吉] 坚赞与上尊五世达赖喇嘛二人会晤，班禅额尔德尼曰：东方有一女真汗甚为强大，[不知] 能否成为吾方施主。[为此] 两人商定派遣一人前往，于是从雪域众贤者中选定西布札衮如克，因为他有为皇帝效劳的缘分。五世达赖喇嘛从其所供奉的诸佛像中抽取一幅与众不同的用鼻血绘制的威猛吉祥天女像交与了然坚巴。
>
> 然坚巴在其三十八岁时秘密来到东方盛京，觐见博格达汗，说明奉两喇嘛之命前来 [效劳] 之意。上闻大喜，命其暂住席勒图库稜。彼时是否见到了满朱习礼喇嘛，不明，应是相见了。[因为] 满朱习礼喇嘛有法旨曰：然坚巴与满朱习礼喇嘛相见，详细商定政教事务，因满朱习礼喇嘛年事已高，不能久居于位，告知然坚巴日后为皇帝之政效劳的时机，将 [弘扬] 佛法之事交与了然坚巴。然坚巴记录了满朱习礼喇嘛的事迹。

---

① 陈庆英等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年，第 61 页。

② 也有说 1626—1632 年间任甘丹赤巴，参见夏玉・平措次仁：《西藏历史大事年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68 页。

③《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11 页。

④ 关于林麦夏仲事迹主要参考《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8 页“嘉央官却群培”条注释以及《东噶藏学大辞典》khri-chen dkon-mchog chos-vphel 条，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64 页。东噶辞条等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桑达尔杰先生汉译并为我查阅相关资料，在此谨表谢意。

⑤ 若松宽：《〈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汉译文见《蒙古学信息》1999 年第 4 期。

⑥《东噶藏学大辞典》，gsang phu nevu thog dgon（桑浦寺）条，第 2122 页。

满朱习礼喇嘛是引领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额齐格喇嘛，法号满朱习礼胡土克图，是席勒图库稜的创始人。① 天聪三年（1629）他受爱新国 / 后金国汗皇太极邀请，四年自喀喇沁入住后金都城盛京，六年移住法库山（baγ-un aγula，位于今辽宁省法库县），七年选定今库伦旗一带为其师徒驻锡地，被称为"满朱习礼 [胡土克图] 之库稜"，简称"库稜"。崇德元年（1636）八月十五日，满朱习礼喇嘛圆寂于法库山。② 从《诺们汗传》可知，时称"强林西布札然坚巴"的诺们汗，在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圆寂前夕来到库稜，后来还为其立传。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了《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之首篇《胡土克图满朱习礼喇嘛传》的来源。

从引文所描述班第大诺们汗与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的关系，很容易推知其来到盛京的时间，即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病重到圆寂之乙亥（天聪九年–1635年）至丙子（崇德元年–1636年）年间。若松宽将上一段引文与《五世达赖喇嘛传》所记四世班禅与达赖喇嘛商议于铁龙年（1640）派遣车臣绰尔济前往盛京一事臆连，从而否定上述西布札然坚巴事迹。③ 其实，这不是一回事，因为《诺们汗传》后文明确记载龙年（即铁龙1640年）车臣绰尔济觐见皇帝——博格达汗皇太极一事：

> 其后龙年，两圣（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派遣车臣绰尔济携带礼物与书信觐见皇帝。皇帝大喜，降旨令各自表贡，位列 [朝贡者] 首位。

因此不能将西布札然坚巴事迹与车臣绰尔济以及与之共同出使清朝的戴青绰尔济晋巴嘉措相混，④ 更不能据此否定西布札然坚巴作为班禅、达赖喇嘛密使来到盛京的事实。

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西布札然坚巴于天聪九年至崇德元年间以班禅、达赖喇嘛密使身份来到盛京并觐见清太宗皇太极。这是西藏格鲁派高层与清廷建立关系的开始，是清藏关系史上尚不为学界所知的一件大事。

早在天聪四年，刚刚投奔后金的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就建议天聪汗遣察罕喇嘛出使西藏达赖喇嘛处。天聪汗接受其建议，于同年派察罕喇嘛等出使喀尔喀，欲联络喀尔喀，共同遣使达赖喇嘛。但是，察罕喇嘛岭北之行恰遇蒙古大汗林丹讨伐阿鲁诸部及喀尔喀，察罕喇嘛等未能与喀尔喀接触便返回。⑤ 五六年后，当西布札然坚巴来到盛京后，清太宗从他口中得知，达赖喇嘛、班禅等格鲁派上层亦有意与他结为施主与供养喇嘛关系，于是在这年十一月底再度派遣察罕喇嘛率六十四人使团出使喀尔喀，商议与喀尔喀共同邀请达赖喇嘛事宜。⑥ 崇德二年八月，车臣汗致书博格达汗清太宗，表示愿意与清朝一起延请达赖喇嘛。⑦ 但是，当双方真正着手落实此事时，关系再度恶化，终因喀尔喀方面放弃联合延请而搁浅。⑧

西布札然坚巴以密使身份出使清廷，虽是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大师和哲蚌寺五世达赖所

---

① 额齐格喇嘛事迹，《俺答汗传》和《蒙古源流》有记载。此外，《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第一份传记即《胡土克图满朱习礼喇嘛传》（据《诺们汗传》，其事迹由诺们汗记录）。据传文：其俗名西剌布（širab，源自藏语 shes rab，智慧），因是三世达赖喇嘛舅家人，故号阿升喇嘛（ašang lama、ašing lama，源自藏文，意为舅父）或额齐格喇嘛（系蒙古语舅父—naγaču ečige 的省称，意为舅父喇嘛）。

② 参见《胡土克图满朱习礼喇嘛传》。有关研究参见齐格奇：《阿兴喇嘛族系事迹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1983年第3期）；前引若松宽：《〈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最新研究参见乌云毕力格：《内齐脱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及拙作：《爱新国 / 后金延请达赖喇嘛的最初尝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额齐格喇嘛致天聪汗书"解读》（《蒙古史研究》第15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③ 参见若松宽：《〈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

④ 关于戴青绰尔济晋巴嘉措事迹，参见拙作：《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⑤ 参见拙文：《爱新国 / 后金延请达赖喇嘛的最初尝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额齐格喇嘛致天聪汗书"解读》。

⑥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己酉、甲子。

⑦《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192页。

⑧ 参见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遣，因达赖喇嘛还年轻（时年 18 岁），实际主导者是林麦夏仲，因此他选择自己的弟子。另外，从林麦夏仲论，五世达赖是西布札然坚巴即班第大诺们汗的同门法弟，而这一层关系极其重要，研究相关历史不能忽略。

据本传，班第大诺们汗 38 岁来到盛京，鸡年（顺治十八年辛酉，1657 年）二月二十六日去世，可推知其生卒年为 1598（或 1599）-1657 年。

三、在清廷的政教活动

来到清廷后，西布札然坚巴先后得到清太宗、清世祖的礼遇，频频参与、主持清朝重大政教事务，《诺们汗传》对此均有记载。这里根据其记载顺序，结合《清实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文献的有关记载略作考述。[①]

为实胜寺诵经开光　班第大诺们汗暂住库稜达尔汉绰尔济处不久，受到召请赴盛京做法事。对此《诺们汗传》只有简单记载：

> 住在达尔汉绰尔济之处时，得皇帝召请，到盛京为皇帝做法事。

此条当指其为实胜寺诵经开光一事，见《清太宗实录》（康熙本）崇德三年八月辛卯朔记载：

> 赐实胜寺诵经西布札喇嘛、托音喇嘛、虾喇嘛、噶布褚喇嘛、讷木汉[②]喇嘛宴。

关于创建实胜寺原委以及清太宗博格达汗亲率诸王、贝勒、外藩蒙古首领拜麻哈噶喇佛一事，《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八月壬寅）以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有详细记载，兹不赘引。[③]其中受赏赐喇嘛有毕礼克图囊苏喇嘛、什布察喇嘛、嘎布楚喇嘛、托音喇嘛、希雅喇嘛（应译作"虾喇嘛"）、诺莫浑（应译作"讷木汉"）喇嘛等六人。后五位即八月初一诵经五喇嘛，为首的"什布察喇嘛"就是西布札喇嘛。

倡建盛京护国四塔四寺　关于倡建盛京四塔四寺之事，《诺们汗传》记载：

> 同时，经占卜上奏：依本喇嘛所见，应在盛京四方建立四座佛塔、佛寺，如此则皇帝延寿，国政永固。不久，依此建成。皇帝诏令从四十九扎萨克旗叫来一百零八位沙弥，令七十人住库稜做法事，其余三十八人分住盛京四寺。

为了祈福国运长久，清廷在诺们汗建议下于盛京四方建立四塔四寺。对于四寺四塔建立原委以及开光典礼，《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顺治二年六月十九、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日诸条有详细记载，此略。北塔开光时，"钦命摄政和硕郑亲王、多罗饶余郡王、硕塞阿哥、内大臣、侍卫、梅勒章京以上诸员朝服至塔，诸王、众人皆摘凉帽，向锡卜扎喇卜占巴喇嘛行三跪三叩头礼。"[④]"锡卜扎喇卜占巴喇嘛"即西布札喇嘛，从摄政王等对他"行三跪三叩头礼"足见其尊贵地位。

预言顺治皇帝登上汉地皇位的时日　对顺治皇帝进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诺们汗传》有简略记载：

> 不久，当世宗（"世祖"之误，下同）以大军战胜李自成，取得了汉地皇位之时，然坚巴按满朱习礼喇嘛所讲，预言了大皇帝即位日期和时辰。

顺治皇帝在北京再次登基的日期、时辰均由班第大诺们汗选择，据说这还是满朱习礼胡土克图预言的。

---

① 日本学者池尻阳子的近著《清前期西藏佛教政策》专门设《班第大诺们汗事迹》一节，利用《诺们汗传》探讨其事迹，但受若松一些误说影响，收获不多。参见该书第 50-65 页，日本汲古书院，2013 年。

② 蒙古语 nomuqan（意为"温顺"），不能与"诺们汗"相混。

③《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354-357 页。

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 27-28 页。

参加顺治皇帝亲政大典为其做长寿灌顶 《诺们汗传》还记载其参加顺治皇帝亲政大典以及为顺治皇帝做长寿灌顶一事：

> 某时，皇帝曾令席勒图绰尔济经缜密占卜上书奏报皇位如何方能永固。第八年辛卯春，皇帝遣使急召，喇嘛迅疾启程，到达通州后，用八抬大轿抬入八里桥，[再] 用皇帝所骑乘的鞍辔马和品尝的茶迎接，住进了黄城（指皇城）的黄寺。
>
> 奉诏与宫中喇嘛一同举行回遮仪轨、施垛马仪轨，念诵《护法酬补仪轨》十万次，《大护法朵玛供》九十次，《六字真言咒》一亿次，《长寿佛心咒》一千万次，《尊胜佛母心咒》四万次，获“班第大诺们汗”称号。
>
> 四大王[①]代表皇帝请为皇帝做长寿灌顶，喇嘛做了长寿灌顶，皇帝因法事赏赐（贡献）了金鞍辔马一、银千两、绸三十匹。太后和王闻后又赏赐（贡献）鞍辔马一、银五百两、绸十五匹。

顺治八年正月，顺治皇帝亲政，时任库棱席勒图绰尔济的西布札然坚巴与宫中喇嘛一同举行五大本尊仪轨，诵经多日。更为重要的是为皇帝做长寿灌顶，因而得到“诺们汗”称号。当时顺治皇帝刚过十三岁，让诺们汗灌顶，使后者觉得获得类似于元朝的“灌顶国师”地位，从此西布札然坚巴以“诺们汗”闻名于世。

修建“景山”白塔及黄寺 《诺们汗传》还记载其建立今北海白塔及黄寺的事迹：

> 在黄城内的“景山”[②]顶上修建了一座尊胜塔（usun niqa suburγa[③]），塔前立有吉祥天女和狮面母两面之身的 [三根牛毛幢]，不知其缘由的人们说：这是汉式长木旗杆。
>
> 在黄城内，修建了供奉千手千面的白伞佛母和三世佛的寺庙，在那里安置了一百零八位弟子。又在黄寺修建了三世佛之坛城，从蒙古地方召集一百零八位弟子，令萨木鲁阿升然坚巴晋巴嘉措[④]为大喇嘛。规定偶尔在皇城墙上吹螺号巡逻之制，至今仍在奉行。

这些记载以及前文所引预言顺治皇帝登上汉地皇位的时日等记载与《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所载塔尔寺喇嘛晋巴嘉措事迹相近：

> 巴州寺 (ba jovu dgon) 丹巴达吉林 (bstan pa dar rgyas gling), 由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 (se che chos rje) 晋巴嘉措 (sbyin pa rgya mtsho) 修建。他生于尼唐寺 (nyi atng dogn)[⑤] 附近。当时，按照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提出的满洲（jurchin）的皇帝势力日益强大，去看看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施主的指示，他于第十一饶迥的铁龙年（1640 年）前去穆克顿 (mug tun)。一到该地，立刻瑞相纷呈，他被皇帝尊为应供喇嘛。木猴年（1644 年）年底，东方皇帝的京城发生了时变，流贼夺取了大明崇祯皇帝的皇位，但是未能保持住，又丢失于满洲之手。他预言了顺治皇帝前去登上众敬王的皇位的日期时辰，并和皇帝一同到了北京。皇帝登上御座之后，为了使社稷稳固，他在皇城里的“僧山”（zin shan）[⑥]的顶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塔前立有吉祥天女和狮面母两尊所依止的三根牛毛幢。这三根幢，现在的人们不知其来历，改成了三根汉式的长旗杆。在皇城外的后面，为了保佑社稷，修建了黄寺和佛经、佛像、佛塔。有一些时候，为了改变事情缘起，

---

① 当时四大摄政王之首多尔衮刚刚去世，应作三大王（郑亲王济尔哈郎、信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② “景山”为明代京城“万岁山”，顺治十二年改此名，这里是崇祯皇帝自缢处，所以紫禁城内的最大凶煞便是崇祯皇帝的孤野之魂。因此格鲁派喇嘛们认为尊胜塔必建造在“景山”上。其实，当时尊胜塔并未建在景山，而是建在了北海“琼华岛—琼华山”。

③ 蒙古文作 usun niqa，是 usuni sa 的误写，源自梵文 usnisa。

④ 库棱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和库棱席勒图达尔汉绰兄弟之侄，库棱第四任（1655-1559）绰尔济—法台，第二任扎萨克大喇嘛，《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第四篇传记为其传记，详见后文。

⑤ 尼唐寺（nyi atng dogn）在拉萨曲水县聂塘（snye thang，即 nyi atng dogn 的别写）地方，参见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7 页。

⑥ 当是 dzin shan 的误书，即“景山”。

规定了在城墙上吹号角巡逻的制度，至今仍在奉行。①

《塔尔寺志》所记亦相似，说晋巴嘉措（汉译本作“敬巴嘉措”）先后被博格达汗和顺治皇帝封为“国师”和“灌顶国师”，预言了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和即位时间。为镇紫禁城内的凶煞，在“圣海”② 山上修建白塔；为社稷永固，在城外修建黄寺。后来又奉敕建立巴州弘善寺（汉译本误为“宏昌寺”）。③ 这些引起学界误会，导致有人将班第大诺们汗视为晋巴嘉措。④ 本人已考证出晋巴嘉措是 1640 年与车臣绰尔济一同出使清朝的戴青绰尔济，1643 年车臣绰尔济返藏后，他留居清朝皇宫四年多，成为清太宗、清世祖“国师”，1647 年返回。⑤ 因此，顺治初年清廷内的政教事务有些是班第大诺们汗与戴青绰尔济晋巴嘉措共同参与的。而《安多政教史》所谓晋巴嘉措修建北京佛塔和黄寺，肯定有误。因为 1651–1652 年修建北海白塔和东西黄寺时，戴青绰尔济已不在北京，因此他最多是倡建者之一，而真正负责设计建造的是“治佛脑木汗”即班第大诺们汗。

四、出任席勒图库稜法台创建兴源寺

崇德元年，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圆寂。同年其弟达尔汉囊素（打剌汗囊素）喇嘛被清太宗任命为库稜“席勒图绰尔济”（法台），负责管理原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僧徒。当天聪九年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病危时，曾奏请天聪汗在他圆寂后“勿使吾弟子离散”，天聪汗应允：“非但不让你弟子离散，还要将四十九旗所有喇嘛聚集于库稜居住。”⑥ 于是自丙子年（崇德元年）至戊寅年（崇德三年）达尔汉绰尔济按天聪博格达汗谕旨将“四十九旗”的喇嘛聚集到库稜居住，统一管理。⑦

顺治二年（1645），席勒图达尔汉绰尔济圆寂，西布札然坚巴奉顺治皇帝之命继任席勒图绰尔济，从此以“锡伯扎绰而吉”或“席勒图绰尔济”闻名。同时清廷还授予其扎萨克印，令其管理库稜私属人口——沙弥纳尔，由此席勒图库稜扎萨克喇嘛旗正式设立。而向席勒图绰尔济喇嘛颁发扎萨克喇嘛印信则标志着该旗政教权力的合一。对此《诺们汗传》记载如下：

> 世宗（应为世祖）皇帝三年，皇帝赐然坚巴“席勒图”职位，令住上师喇嘛之庙⑧，授予扎萨克印。

担任席勒图库稜绰尔济即扎萨克喇嘛后，诺们汗在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开创的库稜之地兴建兴源寺（eki yögen badaraγuluγči süm-e）：

> 不久，上奏皇帝：若在此建造庙殿、佛尊，召集沙弥，举行法会，则皇帝可延寿，国祚如夏雨般绵长。因所奏正合圣意，从六年己丑三月到 [庚] 寅年底历两年建成了大雄宝殿，在热振尊者白毡神前建立了弥勒等三世佛像。按先前所请，达赖喇嘛赐寺名 γandančoyiling（源自藏语 dgav ldan chos ging，甘丹教法洲），皇帝则赐名兴源寺（šiširabǰailing，源自藏语 šiši rab rgyas ging，兴旺洲）。选一百零八位僧人受戒住庙。开光后将寺庙托付吉祥天母本寺护法神护佑。

兴源寺虽是席勒图绰尔济所建，但事先奏请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并得到达赖喇嘛命

---

①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175–176 页；同时参考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 年第 1 期）中的汉译。

② “圣海”似为“琼海”的误译，北海旧称“琼华海”，岛为“琼华岛”。

③ 参见罗桑楚臣嘉措著，郭和卿汉译：《塔尔寺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25–226 页。

④ 双宝：《有关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西布扎衮如克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⑤ 参见拙文：《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⑥ 参见《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之第一份传记《胡土克图满珠习礼喇嘛传》。

⑦ 参见《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之第二份传记《席勒图达尔汉绰尔济传》。该喇嘛事迹将另文探讨。

⑧ “上师喇嘛之庙”指满朱习礼创建的库稜。

名的法旨和顺治皇帝赐名的圣旨。更为重要的是，兴源寺的创建及库稜的兴起是清廷统一管理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喇嘛及其沙弥纳尔政策的产物。因此，库稜兴源寺很快取代归化城的大召，成为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格鲁派宗教中心。

五、迎送五世达赖喇嘛

当清廷与喀尔喀共同延请达赖喇嘛一事陷入僵局之时，崇德七年十月，清廷迎来以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班禅、达赖喇嘛和顾实汗使团，由此清廷与格鲁派高层间直接交往之门被打开，清廷单方面迎请达赖喇嘛之事便有了可能。① 崇德八年五月，车臣绰尔济率使团返藏，清廷派以察罕喇嘛为首使团相随前往迎请达赖喇嘛，并给班禅、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各派首领颁发敕书、送去礼物。② 八月，清太宗驾崩，使团暂停于归化城库库和屯或鄂尔多斯，等待新君指令。次年正月，摄政王多尔衮以顺治皇帝名义派出使臣，不久与车臣绰尔济、察罕喇嘛使团会合，于是年末到达拉萨。③ 察罕喇嘛使团在西藏会晤僧俗各派，历时一年多，直到顺治三年九月才回到盛京。

对于清廷察罕喇嘛使团的第一次延请（当是口头邀请），达赖喇嘛未作出明确答复。于是清廷于顺治四年二月再遣虾喇嘛等存问达赖喇嘛和班禅，使臣于年底到达拉萨。④ 次年五月，清廷再度派出以席喇布（喜饶）喇嘛为首使的使团，“敦请”达赖喇嘛，并致书班禅、顾实汗（讷门汗），“俾劝达赖喇嘛来京”。⑤ 对于清廷的“三顾”，达赖喇嘛不能再拒绝，于是在牛年（顺治六年己丑）二月致书顺治皇帝，答应于辰年夏殿见，书信由席刺布格隆带回。⑥ 同年十一月，达赖喇嘛与顾实汗遣噶布初西喇布（噶居喜饶）喇嘛、默尔根和硕齐朝贡，清廷遣诺木齐喇嘛等随噶布初喇嘛赴藏，再次召请达赖喇嘛赴京殿见。⑦ 顺治八年正月顺治皇帝亲政，于三月初八和四月初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派出两批急使“往召达赖喇嘛”，约达赖喇嘛于龙年七月相见。三月所遣使臣为策凌（才让），是四月份派出的正式延请达赖喇嘛使团的先遣使。⑧ 正式延请使团由多卜藏古西、多吉达尔汗诺颜、察罕格隆、喜饶喇嘛、噶居喇嘛五位“金字使者”率领，九月到达拉萨。⑨ 至此，达赖喇嘛终于排除反对其赴京的僧俗各派阻挠，郑重承诺“将尽一切努力前来”。⑩

---

① 《清太宗实录》卷 63，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关于这一使团的组成、出使背景以及为首使臣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身世等问题的最新研究，参见拙文：《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

② 《清太宗实录》卷 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

③ 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13 页；拙文：《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

④ 《清世祖实录》卷 30，顺治四年二月丙戌；《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35 页。乾隆本《清世祖实录》使臣名作“喇嘛侍卫格隆”，康熙本作“喇嘛虾”。他是前文为实胜寺开光诵经的五位喇嘛之一。《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的“克雅喇嘛”，即“虾喇嘛”，“虾”系蒙古—突厥语“kiya”的音写，意为“怯薛”“侍卫”。

⑤ 《清世祖实录》卷 38，顺治五年五月甲申；《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47 页。席喇布喇嘛所携顺治皇帝敦请达赖喇嘛的书信以及致班禅、顾实汗令其劝请达赖喇嘛来京的书信原文见《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13 页。

⑥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75、87、248 页；《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67 页。《清世祖实录》卷 45，顺治六年八月丁酉；卷 68、九年九月壬申（康熙本《清世祖实录》该条所记达赖喇嘛的答复是：“我今不往，必欲我往，可于卯年送马匹来，辰年前往”，当是达赖喇嘛口信）。

⑦ 《清世祖实录》卷 46，顺治六年十一月辛巳；《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56 页。

⑧ 延请文书作“先派出的使臣”（urida ilegegsen elči），参见《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242－243 页。

⑨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242－243 页；《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67 页；《清世祖实录》卷 56，顺治八年四月丁未。

⑩ 直到色钦温布、波若才让来到拉萨之时，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上师和执政们仍然在“尽力阻扰”达赖喇嘛赴京，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67 页。

如前所考，班第大诺们汗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同门法兄，又是顺治皇帝的“灌顶国师”，在清朝的各位喇嘛当中地位崇高，因此无疑是迎送达赖喇嘛之不二人选。顺治皇帝得知达赖喇嘛同意前来会晤时，便下令让诺们汗负责迎送达赖喇嘛事宜。对此《诺们汗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将其与《清世祖实录》《五世达赖喇嘛传》等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后发现，所记可信度极高，作为基础史料可互补。下面就迎请达赖喇嘛时诺们汗主导的大事作简单考述。

请达赖喇嘛在西藏为顺治皇帝咏诵《甘珠尔经》 在迎请达赖喇嘛之际，诺们汗让赴藏使臣向达赖喇嘛进献大量财物，请其为顺治皇帝做经忏法事，念诵《甘珠尔经》：

> 为迎请达赖喇嘛，[皇帝] 派遣以车臣诺颜、策凌二人为首赴西藏，诺们汗为 [皇帝] 诵咏《甘珠尔经》、做经忏法事，[让二人] 带去了大量财物……皇帝遣往西藏的两个人迅速返回，很好地完成了迎请 [达赖喇嘛] 之事和 [诵咏《甘珠尔经》之] 法事。

此事又见《五世达赖喇嘛传》铁兔年（1651）七月记事：

> 皇帝派色钦温布和波若才让二人火速送来圣旨，敦促我迅速启程进京……我派布若才仁和色钦达杰去皇帝尊前呈献将尽一切努力前来的口头报告。
>
> 虽然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一年动身，但是皇帝的圣旨关系重大，要我必须在龙年 (1652 年) 启程去汉地……因此，我于八月二十九日匆忙离开哲蚌寺，踏上旅程，在大昭寺逗留了五天。此时皇上派遣的以喜饶喇嘛、噶居喇嘛、察罕达尔汗曲杰、多卜藏古西、多吉达尔汗诺颜五位钦差为首的召请我的使者二百多人抵达拉萨，向我颁发了圣旨、金银、缎匹等大批赏赐物品。喜饶喇嘛和诺门汗向我递交白银一万两，作为给皇帝做经忏法事念诵《甘珠尔》经的费用。[①]

策凌（波若才让）就是顺治八年三月派出的先遣使。由于他和色钦温布[②]从拉萨“迅速返回”北京，向顺治皇帝报送达赖喇嘛口信，诺们汗让他俩递交给达赖喇嘛、为皇帝做经忏法事而念诵《甘珠尔经》的费用白银一万两，改由后续使团的席喇布格隆（喜饶喇嘛）代为转交。[③]这位席喇布格隆曾于顺治五年出使西藏“敦请”达赖喇嘛。他还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传》火狗年末记事：

> 色钦曲杰嘉哇赤列巴在喀尔喀身染沉疴，喜饶喇嘛前来为他举行经忏法事。当他返回时，我们命他向大皇帝上表献礼。[④]

“色钦曲杰嘉哇赤列巴”就是奉班禅、达赖喇嘛之命于崇德七年来到盛京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可知喜饶喇嘛是与他关系密切、而且为清廷服务的一位高僧。

前往库库和屯作迎接达赖喇嘛的准备 达赖喇嘛因畏惧内地疾疫，不愿到北京，一直约顺治皇帝在长城外归化城库库和屯或代噶（今内蒙古凉城县岱海）相见，因此在顺治八年八月间双方多次书信往来，商议此事。[⑤]顾实汗还特意致书顺治皇帝，建议：“因与皇帝圣躬和大政有所裨益，特延请达赖喇嘛。此与古时皇帝与喇嘛相见之情不同，当尽心尊崇达赖喇嘛，唯其言是听，则甚是。吾意应遣大臣到国境迎接，随后由王迎接，皇帝圣躬在代噶相见为宜。”[⑥]起初，顺治皇帝致书告知达赖喇嘛：“西南有盗贼起，届时若还未平定，不宜弃国之大事，出长城远

①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66–267 页。

② 延请文书只记策凌（波若才让）名，不见色钦温布之名，颇疑他是诺们汗的使臣。

③ 内秘书院档案顺治八年三月初八日，顺治皇帝致第巴书载：“为在大召前诵《甘珠尔经》百遍经，送去茶斋费银二万两，交予第巴，如何召集众喇嘛 [诵经] 第巴知之。”二万两银中当包括诺们汗所给一万两。参见《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246–247、253–254 页。

④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28 页。

⑤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335–336、341–342 页；《清世祖实录》卷 67，顺治九年八月戊辰；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庚辰、庚寅；卷 69，顺治九年十月丙午。

⑥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337–338 页。

迎。若盗贼事平，自当远迎”。[①] 抵达青海后，达赖喇嘛再次致书顺治皇帝，直言：汉地多大疫病。吾与弟子多未出痘。皇帝也未出痘。于内地相见并居住，恐对你我有害。至此，顺治皇帝只得答应达赖喇嘛到代噶迎接。[②] 为迎接达赖喇嘛，顺治八年夏派班第大诺们汗前往库库和屯作迎接达赖喇嘛的准备。《诺们汗传》云：

> 那时，为准备达赖喇嘛来途中的大事，诺们汗来到了库库和屯。[当初] 土默特诺尔布台吉、丹巴嘉措、策松 [本] 等见到诺们汗时对其行为不满，不久因自己的缘故没落了。

顺治九年（1652），达赖喇嘛在赴京途中来到库库和屯，见到诺尔布台吉等人，在其自传水龙年十月二十六日记事中有如下记载：

> 土默特部的诺尔布台吉、丹巴嘉措、策桑本这些人，确实是从前的王族后裔，如今他们却像奴仆一样生活着，这表明世间的荣华富贵的确不可靠。据说喜夏热绛巴初到库库和屯时，土默特王和诸台吉没有供奉他，因此他记恨在心，用计谋进行伤害。[③]

此处达赖喇嘛所记显然与上引《诺们汗传》记载为同一事，“喜夏热绛巴”就是“西布札然坚巴”，[④] 是班第大诺们汗刚刚来到库库和屯时的称号。《诺们汗传》“为尊者讳”，未记其早年陷害土默特汗王（顺义王俄木布）和诺尔布台吉等人一事。

诺尔布台吉（大、小诺尔布）是土默特末代顺义王俄木布亲族，他们在林丹汗去世后于天聪八年九月归附后金，次年八月住归化城养病的岳托贝勒以擅自与喀尔喀贸易罪拘禁俄木布。[⑤] 诺尔布虽未被牵连，不久还被授予甲喇章京衔，但原有地位早已不在。[⑥] 达赖喇嘛早年得到过来自库库和屯僧俗界大量贡献，对其富有记忆深刻，称之为“财神的宝库”。[⑦] 当二十多年后目睹清朝统治下的诺尔布等人的没落境况时深感失望，所以才有上述感慨。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俄木布冤案背后还有班第大诺们汗出于嫉恨的陷害，不止俄木布属下古禄格楚虎尔（满官嗔人即蒙古化的兀者人，与叶赫同源）等人卖主求荣的告密，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究。俄木布冤案发生在天聪九年，班第大诺们汗曾牵涉此事，由此可进一步证明：他最初是在天聪九年来到库库和屯，同年或次年到达盛京的。

前往代噶迎接达赖喇嘛并陪同其进京　众所周知，顺治皇帝最终还是听信汉臣建议，未到代噶亲迎，而派承泽亲王硕塞代表自己迎接达赖喇嘛。诺们汗则以“国师”身份一同前往。《诺们汗传》对于其在顺治九年、十年间迎送和陪同达赖喇嘛之事记载尤详，关于迎接达赖喇嘛，传文云：

> 那年冬，得到达赖喇嘛大驾光临之书信。[⑧] 龙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帝召诺们汗的文书来到，得圣旨：带领十名好诵经师，八月来京，不得有误。八月奉旨来到京城等待之际，达赖喇嘛途中自 [青] 海边捎来一封书信，令于十一月在 dalqar 之地迎接。书信末尾云：尚有要事 [面谈]。[⑨] 彼时诺们汗与扎仓绰尔济赛哇然坚巴一同前往迎接，在 dalqa 庙 [⑩] 与达赖喇嘛相见，赠送了哈达、

---

①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339 页。

②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341-344 页。

③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16 页。

④ “西布札”（šibǰa）是“喜夏”（shes-bya）的蒙古式发音。

⑤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20，天聪八年闰八月壬辰；卷 24，天聪九年八月庚辰。

⑥ 《清太宗实录》卷 42，崇德三年六月庚申。

⑦ 《五世达赖喇嘛传》卷 62，第 76、80-81 页。传文中称俄木布为“温布珲台吉”。

⑧ 《清世祖实录》卷 62，顺治九年正月癸酉，载“达赖喇嘛表奏来朝起行日期”。

⑨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卷，第 344-345 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庚寅；卷 69，顺治九年十月丙午。

⑩ 与前文 dalqar 同指“代噶庙”。dalqa-dalqar 或为 daiqa-ddaiqan 的藏式读法。

黄帽、黄披风、珍珠念珠。①之后于腊月十六 [陪同] 达赖喇嘛赴与皇帝见面之宴会。皇帝虽年小，但在语言不通的众人中，犹如狮子行走在林中，毫不畏惧。② 随之达赖喇嘛入住黄寺……蛇年正月初一觐见皇帝，参加喜宴。③ [二月] 十八日达赖喇嘛返回黄寺，向三世佛殿撒花，祝愿吉祥，④诺们汗向达赖喇嘛进献珍珠念珠一，黄金三百两及哈达、帷幔。⑤ 二十日达赖喇嘛离开黄寺启程返回。此时诺们汗上书皇帝：圣躬如须弥山，立政教二道于十方，功德无量。微臣为达赖喇嘛安康 [为其返程] 值了吉位⑥，并为利益众生而祈福。[皇帝] 邀请我之书信到达之际，于龙年七月出发，因来途遥远、礼仪繁重，加之我福德浅薄，对于圣上交办之事未能尽善。圣上年轻，[达赖喇嘛] 虽不能叩头，然汉地凶险，水恶天热，多疫病，[托圣上之福] 达赖喇嘛身心康乐，携所有贡献满意而归。日后，吾身语意追随达赖喇嘛，别无他意。达赖喇嘛所赐福祉无限，[今后] 贵贱僧俗之人听我之言与否，只祈求达赖喇嘛与吉祥天女 [保佑]。祈求吾心常在圣上心中，献上书信、哈达及珍珠念珠两个、[黄金] 五十两。

理藩院题本中存有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份满文题本，我们命名为《理藩院尚书尼堪等题议班第大诺们汗于达赖喇嘛自代噶启行前仍令暂留该地本》，其中也援引诺们汗自黄寺所上文书部分内容："我为调伏土地、河水凶煞，利益圣躬和大政而来，一切法事圆满，建立了福业。自达赖喇嘛与皇帝见面一直住在这里。如今老衲我欲回家念经。"但是，顺治帝未准，而命其在达赖喇嘛从代噶启程返回之前要一直住在黄寺，为皇帝念经。⑦

五月初，达赖喇嘛自代噶启程返藏。六月十八日，诺们汗再次自黄寺上书顺治皇帝："奉皇帝圣旨，送走达赖喇嘛一行之前一直住在此 [黄寺]，今奉达赖喇嘛法旨，令我回。"理藩院奏请皇帝，得旨："令班第大诺们汗回其驻地。"⑧

六、与内齐托音喇嘛的争斗及其结局

内蒙古图书馆藏有康熙年间刻印的内齐托音喇嘛传记传说《详述至尊内齐托音喇嘛达赖满朱习礼传说之如意宝数珠》（简称《如意宝数珠》），是其弟子和信男信女们对内齐托音喇嘛功德和法术的追记，有不少重要的历史信息。据此可知，内齐托音喇嘛（neiči toyin，1587−1653）出身于卫拉特土尔扈特贵族，年轻时，弃妻子出家，入西藏扎什伦布寺拜四世班禅为师。不久经喀尔喀来到库库和屯，先后在库库和屯东北乌浪卜剌汉山洞和东南阿八哈哈剌山洞修行。⑨1628年林丹汗占领库库和屯后，内齐托音率领其三十名弟子向东逃难，途中在以马兔崖洞⑩拜见过喀喇沁的额齐格喇嘛满朱习礼胡土克图。

当时即 1629 年，清太宗遣察罕喇嘛等出使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处，双方约定建立施主与供养喇嘛关系，为此清太宗在盛京北五里之地专门为其修建住所。1630 年七月，满朱习礼胡土克图

①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18 页）载：强林诺们汗奉献了白日吉祥嵌花缎、帽子、披风、珍珠念珠。

② 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28−329 页。

③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 70，顺治九年十二月癸丑；卷 71，十年正月戊辰。传文"正月初一"当为"正月十一"之误。

④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35 页）记载："十八日……从皇宫返回途中，我给黄寺三世佛殿撒花祝赞。"

⑤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36 页）载：强林诺们汗奉献了以珍珠念珠、黄金三百两以及哈达幔为主的千份礼品。

⑥ 原文 ǰam-γarγaqu（又称 mür γarγaqu），汉译"值吉位"，是藏传佛教一种选定启程或出发方向的仪轨。

⑦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 页。

⑧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一卷，第 16 页。

⑨ 金峰认为前者为今呼和浩特东北保合少镇之灯笼素山之山洞；后者为今凉城县蛮汉山佛爷洞，参见《漠南大活佛传》（原名《如意宝数珠》，是历世内齐托音胡土克图传记，《漠南大活佛传》之名系金峰臆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119−120、130−131 页。

⑩ 《如意宝数珠》，第 35 页下。以马兔是今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塔拉宝力格嘎查之同名山之山洞。

来到盛京，入住盛京住所。[1] 在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入住盛京之后，约在 1631 年，内齐托音喇嘛也率弟子经翁牛特来到后金，向清太宗请安。传说清太宗欲留内齐托音住盛京，内齐托音恳辞，遂去嫩科尔沁传教。在那里，内齐托音游走化缘，得到嫩科尔沁贵族平民的供养，渐渐名声大噪，甚至自诩为宗喀巴大师的转世。[2] 内齐托音还在嫩科尔沁广招弟子，私纳一些朝鲜、汉人人口（多为科尔沁贵族所献战俘），其弟子中亦有不守戒律之“无行喇嘛”。

清太宗迎请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入住盛京，首要目的是建立与西藏格鲁派的联系，以实现其“政教二道”的理想，其次是让德高望重的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管理归附蒙古人各部的众喇嘛们及相关宗教事务。为此，天聪九年，皇太极与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商定，外藩蒙古各旗喇嘛均集中于库稜居住，由满朱习礼额齐格喇嘛统一管理。上述内齐托音喇嘛师徒所为，显然违背了后金 / 清朝既定的宗教政策，因而很早就引起了清太宗的不满。崇德三年底清太宗遣察罕喇嘛等到内齐托音及其弟子处，收其多招收的弟子交予席勒图库稜达尔汉绰尔济（1636−1645 年间席勒图库稜绰尔济—法台），“所私自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只许内齐托音喇嘛率三十四名弟子化缘而行。[3] 受到惩戒后内齐托音喇嘛师徒并未收敛，在清太宗去世后他们自恃是新皇帝舅家所供奉喇嘛，继续超额招收弟子，“私设格隆、沙弥六十五人”。[4] 负责管理外藩蒙古喇嘛事务的诺们汗自然不能容忍这些，至顺治八年遂将此事上告摄政三王，三王有令：“既已收集，可令其存留，自此以后，不得擅设格隆、沙弥。”由此，内齐托音喇嘛师徒与席勒图库稜方面积怨，双方僧俗信徒也各自偏袒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进京之际，双方都向其控告对方，矛盾骤然升级。诺们汗借负责迎接达赖喇嘛之机向达赖喇嘛控告内齐托音喇嘛师徒，特别是其自诩为宗喀巴大师转世等对达赖喇嘛大为不敬的行径；内齐托音喇嘛也进京会见达赖喇嘛，奉献上二千两白银，也向达赖喇嘛告发诺们汗，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传》才有对诺们汗“不能忍受对方的权势”“心生妒忌”等评价。[5]

顺治皇帝认为，“二位喇嘛不和的根源在于教法”，于是令其“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裁决。达赖喇嘛内心则认为双方不和的根源在于其弟子和信徒们对各自上师的偏袒，于是“公正地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裁定，将争执止息在宗教方面”。达赖喇嘛的裁决令顺治皇帝很满意。[6] 但是，达赖喇嘛还未从代噶启程返藏，其自认为公正的裁决并未得到完全遵守，当事人诺们汗在顺治皇帝支持下主导了对内齐托音喇嘛师徒的处置：内齐托音喇嘛与其最初在归化城招收的弟子等三十八人被遣返归化城（内齐托音喇嘛被安置在归化城小召），多招弟子六十五人交予席勒图库稜，私占朝鲜、汉人只留一汉丁侍奉双目失明的内齐托音喇嘛，其余五十一人交予户部。[7] 至此，内齐托音喇嘛与其成就功德之化缘地、供养人——哲里木盟嫩科尔沁人隔离。

在诺们汗与内齐托音喇嘛的争斗中诺们汗和席勒图库稜方面完胜。同是格鲁派的内齐托音喇嘛所代表的蒙古传统社会宗教势力，它必须服从所归附的新政体——清廷的既定宗教（“喇嘛教”）政策，当清廷与西藏格鲁派最高层之间建立政教联盟之后更应如此。

---

① 详见拙作：《爱新国 / 后金延请达赖喇嘛的最初尝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额齐格喇嘛致天聪汗书”解读》。

② 参见《诺们汗传》;《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第 336 页。关于内齐托音喇嘛与诺们汗之间的争端以及达赖喇嘛的裁决，《诺们汗传》的记载与《五世达赖达赖喇嘛传》完全一致，而《如意宝数珠》记载大有不同，参见第 73 页下 −77 页上。

③ 《清太宗实录》卷 44，崇德三年十二月丁巳；《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一卷，第 14−15 页。有关研究参见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相关的顺治朝满文题本》，《青册金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20−242 页。

④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一卷，第 14−15 页；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相关的顺治朝满文题本》。

⑤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32−334 页。

⑥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33−334 页。

⑦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一卷，第 14−15 页；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相关的顺治朝满文题本》。

七、晚年事迹

关于送走达赖喇嘛之后的诺们汗事迹《诺们汗传》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创建吉祥天女神庙，向恩师林麦夏仲灵塔敬献祭供资财等重要事迹，需简要叙述。

请辞扎萨克职位并指定继承人 关于辞去扎萨克职位并向顺治皇帝推荐继任者，《诺们汗传》云：

> 羊年初（顺治十二年乙未）请辞［扎萨克］，皇帝问："何人坐汝之座？答曰：黄寺的然坚巴是满朱习礼［胡土克图］之族裔，他可胜任。"

"黄寺的然坚巴"就是见于《五世达赖喇嘛传》的"黄寺的喇嘛洛桑阿香（阿尚）"[①]。《席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传汇典》有其传记（第四份）。据传文：然坚巴晋巴嘉措，安多萨木鲁贵胄出身，是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后裔（侄），出生于甲戌年，[②] 早年随上师学法，因达赖喇嘛之故，以萨木鲁然坚巴著称。后来来到皇宫，觐见［世祖］皇帝，不久被皇帝任命为黄寺众喇嘛之法师，因严守戒律、学问举止俱佳，宫中称之为"策凌喇嘛"。可知在诺们汗圆寂后，顺治皇帝按其所选，任命黄寺的然坚巴继任席勒图库棱绰尔济—法台。从宫中称黄寺的然坚巴为策凌喇嘛一事，可以判断他是顺治六七年出使西藏的"才让"（"策凌—sereng"是藏语"才让—tsring"的蒙古语形式，意为"长寿"），本传记事重点在其任兴源寺法台时期事迹。因而漏记了出使达赖喇嘛的这件大事。

创建吉祥天女神庙 今库伦旗兴源寺东南约一公里处有座吉祥天女神庙，该庙所供奉的吉祥天女神与盛京实胜寺嘛哈噶喇佛、北京旃檀寺旃檀佛齐名，自清代以来备受蒙古人推崇。如前文所述，当年诺们汗以达赖喇嘛密使身份前来盛京时，五世达赖喇嘛从其所供奉的诸佛像中抽取一幅与众不同的、用鼻血绘制的威猛吉祥天女像交与了然坚巴即诺们汗。诺们汗辞去扎萨克职位后，创建了吉祥天女神庙，安置自己所供奉之神，对此《诺们汗传》云：

> 在此寺庙（兴源寺）闲住之际，修建了吉祥天女神庙，安置了吉祥天女神，制定了法会仪轨。将教法、众生、寺庙、喇嘛等一切托付吉祥天女神护佑。此后，"库稜之护法神是吉祥天女神"一说传遍四方，众人从各处前来供奉，直到今日。

向恩师林麦夏仲灵塔敬献祭供资财 诺们汗之所以能够来到盛京，为清太宗、世祖效力，成就政教大业，建立功德，与恩师林麦夏仲的举荐和遣使密不可分。因此诺们汗晚年向其恩师林麦夏仲灵塔和灵塔所在寺院（甘丹寺？）敬献了大量祭供资财：

> 雪域来信言：珍珠念珠一，玛瑙念珠一，帽子，自己所穿貂皮大氅一，狐皮大氅二，金鞓带一，缎披单一，黑貂皮披风一，靴一双，上好华盖一，金一百三十两，银一百两，貂皮十，黑水獭皮一，黄水獭皮二，珊瑚百，缎两匹等物，未曾丢失，完好尽收。敬献林麦夏仲灵塔之一切，按来信一一实现。给诺们汗之回向礼：藏红花、琥珀念珠一，黄帽，法衣，披单，信氆氇五，红氆氇二十，羊年七月自拉萨赠。

答复皇帝密旨及圆寂 《诺们汗传》末尾记载其答复皇帝密旨所问询之事以及最后圆寂、塔藏等事：

> 此时皇帝以密旨询问诺们汗，诺们汗答曰：我自十二岁至三十七岁从未闻此事。大喇嘛完成普度众生之业，决意前往圆寂之地，于是猴年（丙申）冬上奏获准，选一位弟子任［吉祥天女神］寺庙的大喇嘛，将寺庙、僧人、资产等一切交接，不久于鸡年二月二十六日圆寂。彼时，大

---

①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327、332、333 页。"阿香""阿尚"即"阿升"（ašing，藏语 a zhang，意为"舅父"）。

② 甲戌或为 1574 年，或为 1634 年，但均与其事迹不符，应是在戌年前添加天干时产生的错误，窃以为其生年当为戊戌（1598 年）。

小贵贱等人，按喇嘛遗嘱，三天内完成祭祀、供奉等后事，于寺庙西北建塔安葬。

顺治皇帝密旨询问的具体内容，《诺们汗传》未曾透露。

关于诺们汗的染病以及所选圆寂之地，《清世祖实录》记载："班第大诺们汗以疾恳请出边，欲于喀喇沁、土默特部落一带与席勒图库稜相近地方，水味佳处居住。命理藩院同伯索尼会议，许之。"① 次年二月二十六日班第大诺们汗于边外自选之地圆寂。

八、诺们汗的名号

首先看其本名。《诺们汗传》中称其本名作 šibuǰa günrek。若松宽将 šibuǰa 复原为藏文 shes bya，对 günrek 未理会。藏文 shes bya，汉译"所知，知识"，蒙译"medegdekün"；而 günrek 应是 günrig（藏文 kun rig），意为"遍识"，系佛名，汉译"普明佛"（大日如来）。

在汉文文献中其名 šibuǰa 被译作"悉不遮"或"西布札""锡伯扎"，或以"西布札喇嘛""喇嘛西布札"②"锡伯扎绰而吉""悉不遮绰而吉"③ 出现，满文文献则以 šibuja rabjanba 出现（由汉译"西布扎喇木占霸"推知）④，这正是《诺们汗传》中提到的其著名称号 ǰamling šibuǰa rabǰanba（强林西布札然坚巴）的简称。"喇木占霸"或"然坚巴"（蒙古文、满文 rabǰenb-rabjanba；藏文 rab byams pa）是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所以汉文"西布札喇嘛"或"喇嘛西布札"应是"西布札然坚巴喇嘛"的简称，与满文称号 šibuja rabjanba 均是顺治三年前的称谓，而汉文"锡伯扎绰而吉""悉不遮绰而吉"则反映其顺治三年被任命为库稜"席勒图绰尔济"之后的称号。因此，颇疑盛京护国塔寺四体碑石竖立于顺治三年，而非寺塔建成的顺治二年。

其次是其 ǰamling（强林）称号。若松宽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有关记载最早将《诺们汗传》中的 ǰamling šibuǰa rabǰanba（强林西布札然坚巴）复原为藏文 byams-gling shes bya rab byams pa，并准备撰写一篇关于西布扎喇嘛事迹的详细考证的论文，⑤ 只可惜至今未能见到。但是，可以肯定 ǰamling 就是藏语 byams-gling（强林）的蒙古语形式。

《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强林然坚巴"称号只一见，是在达赖喇嘛于哲蚌寺坐床的木狗年二月二十五日记事中：当时，年幼的达赖喇嘛在甘丹颇章的寝殿为僧俗人加持，因一时疏忽未把手放到蒙古喇嘛根敦嘉措的头上。这位喇嘛过去曾经伤害过四世达赖喇嘛，因此觉得是五世达赖对他的惩戒，因此对五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深信不疑，后来他将这些讲给强林然坚巴等。⑥ 看来达赖喇嘛幼年便认识其法兄强林然坚巴即后来的诺们汗。

《五世达赖喇嘛传》对诺们汗更多的称呼是"强林诺门汗"，偶尔简称"诺门汗"。⑦ 均见于达赖喇嘛进京前后记事。唯一的例外是水羊年（崇德八年—1643 年）相关记事，但我们认为这是达赖喇嘛的笔误：

> 水羊年 (1643—崇德八年) 隆重地欢度新年。固始汗与额尔德尼珲台吉产生嫌隙。珲台吉主仆少数人打算依靠色拉寺山洛康村隐藏起来，厄鲁特人也显得紧张忙乱。我担心一旦因此而发生有伤善业之事，就会成为破坏喀尔喀和厄鲁特的政务的祸根。我向固始汗郑重地陈述利害，

---

① 《清世祖实录》卷 103，顺治十三年九月庚申。

② 《清太宗实录》卷 43，崇德三年八月辛卯。康熙本作"西布札喇嘛"，乾隆本作"喇嘛西布札"。

③ 参见张羽新辑注：《清代喇嘛教碑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年，第 4 页；李勤璞：《盛京四寺藏语碑文校译》，《辽海文物学刊》1997 年第 1 期。

④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 27 页。

⑤ 参见若松宽：《〈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

⑥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64-65 页。

⑦ 不能与"察罕诺门罕汗""色钦诺门汗""阿巴诺门汗"的简称"诺门汗"以及顾实汗的"诺门汗"称号相混。

贡吉嘉莫王妃[①]对我的意见也表示赞同。我担心珲台吉在途中会遭到伤害，便派强林诺门汗和然坚巴阿旺格勒二人前去迎接，我给固始汗和珲台吉一起传授“六臂依怙随许法”，他们互相立誓和好，关系十分融洽，参加了大小祈愿法会。[②]

温布（俄木布）额尔德尼珲台吉是喀尔喀第二任阿勒坦汗。其父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洪台吉曾经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代表喀尔喀统治卫拉特近四十年，1623年在征讨卫拉特的额莫勒河口之战中被杀。获胜的卫拉特人从此摆脱喀尔喀汗国统治，开始独立发展。1635年起，厄鲁特顾实汗、巴图尔珲台吉联合喀尔喀右翼兀良哈鄂托克的领主们征服青藏高原。阿勒坦汗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原是喀尔喀兀良哈鄂托克的宗主。因此他也以征服者自居，试图更深地介入青藏政教事务。1642年（水马年—崇德七年）六月，他来到拉萨，“为了噶尔巴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前来密商”，与达赖喇嘛过往甚密，还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其藏文和佛学修养令达赖喇嘛赞叹不已。[③]这一年噶玛派对格鲁派的反攻，被称作“水马年之乱”。

“水马年之乱”很快被顾实汗和额尔德尼珲台吉联合平定。但是，额尔德尼珲台吉与厄鲁特毕竟有杀父之仇，加上争夺新征服的青藏高原利益，遂发生尖锐矛盾，险些酿成蒙古内战。奉达赖喇嘛之命调停两者关系的功臣“强林诺门汗”并不是班第大诺们汗。

如前文所述，“班第大诺们汗”这个称号是顺治八年正月参加顺治皇帝亲政大典并为其做长寿灌顶而获得，因此不可能早在水羊年—崇德八年就有“诺门汗”称号。据其本传，诺们汗自天聪九年或崇德元年来到盛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西藏。因此，达赖喇嘛所说派去调停额尔德尼珲台吉与顾实汗矛盾的“强林诺门汗”应是“察罕诺门汗”之笔误。察罕诺门汗（1610−1659）名拉莫·洛追嘉措，是青海土默特首领火落赤之子，由四世班禅认定为前辈的转世，后拜四世班禅为师。1631年觐见达赖喇嘛，[④]顾实汗入藏后成为其施主。从与顾实汗、达赖喇嘛的关系看，在西藏调节顾实汗与额尔德尼珲台吉矛盾的只能是察罕诺门罕。[⑤]

“诺们汗”（nom-un qaγan）谓“法王”，“班第大”（Bandida 源自梵语 pantida），意为“博学者”“五明大师”。顺治皇帝授予的“班第大”称号直接来源于大蒙古国时代萨迦法王班智达贡噶坚赞的称号。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凉州与阔端皇太子会谈，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图。顺治皇帝视达赖喇嘛密使西布札喇嘛若萨迦班智达，希望通过他与西藏格鲁派高层建立联盟，以实现其父皇太极所追求的像大蒙古国—元朝那样的“政教统绪”。[⑥]

---

① 顾实汗嫂夫人，原卫拉特联盟最高首领拜巴噶斯哈屯。“贡吉”即汉语“公主”音讹；“嘉莫”（rgyal mo）即哈屯。从其公主身份推测，应是喀尔喀贵族女儿。

②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201页。

③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98−207页。

④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19页。

⑤ 关于察罕诺门罕，参见若松宽：《察罕诺门罕事迹》，载马大正等编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78−282页。

⑥ 诺们汗的对手内齐托音喇嘛传记《如意宝数珠》（第75页）直接称诺们汗为“萨迦法王”，还说顺治皇帝意欲接受内齐托音的灌顶，诺们汗心生嫉妒，对皇帝进言：“若接受其灌顶，就要对他敬如佛，尊崇跪拜，不然对圣上有害，因此不必接受其灌顶。”传说不一定可信，但暗示了诺们汗不愿内齐托音拥有与自己同样的地位。